

试论杜甫的政治倾向

杜甫研究小组

杜甫（七一二——七七〇年）是我国诗史上盛唐时期的第一流诗人，他以诗歌和文章直接参与议军议政，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冲突，表现了中小地主阶级要求改良政治的立场，具有一定的尊法倾向，尽管这种倾向在他是不很自觉的。他和同时代的进步诗人李白一起，以豪放雄健、沉郁顿挫的如椽之笔，横扫六朝以来的颓靡诗风，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在历史上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永贞改革的斗士王叔文和靖康抗战的名将宗泽，都沉痛地歌咏过杜甫怀念法家人物诸葛亮的《蜀相》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中唐时期的法家诗人刘禹锡，赞赏过杜甫的《清明》诗，自称“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2）；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咏歌杜甫的画像，表示“愿起公死以之游”（3）。至于文学史上的进步诗人，从杜甫作品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和艺术精华的，更是不胜枚举。但是，一千多年来，在儒家反动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封建文人“据孔孟之论诗者以解杜”，杜甫的许多诗歌受到了严重的歪曲，杜甫的一些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章更是被埋没了。今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重新评价杜甫及其作品，批判地继承杜甫这个古典进步作家留下的遗产，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对于进一步开展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史的研究，对于利用历史经验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杜甫生活于我国历史上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篡夺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而建立起来的李唐王朝，在太宗、武后手下推行了一条抑制豪族兼并、加强中央集权、发展农业生产、抵御突厥贵族军事集团侵扰的法家路线，带来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杜甫经历唐代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掌权的时期。从玄宗后期开始，唐王朝一步步地抛弃了太宗、武后的正确路线，而推行了一条导致分裂、倒退的儒家路线。玄、肃、代三代都重用权奸，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宦官外戚的手中。这一小撮豪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骄奢淫佚，飞扬跋扈，内外勾结，卖官鬻爵，把持朝政。他们伙同地方上的豪强军阀和世族地主不断地兼并土地，扩大势力。“畴接壤联，动涉千顷，年登万箱”（4），“炙手可热势绝伦”（5），使唐初以来推行的“均田”、“府兵”和“租庸调”等制度破坏殆尽，造成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6）的局面。加上

玄宗连年发动战争，欺凌少数民族，对人民加紧剥削压榨，“征求贫到骨”（7），“疮痍无血流”（8），更加激化了农民同地主阶级、中小地主同豪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由唐王朝一手挑起的民族战争不仅没有使国内矛盾缓和下来，反而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引起了连绵不断的吐蕃、回纥等贵族军事集团的侵扰，并导致藩镇割据势力的日益膨胀。七五五年，在玄宗实行黜武政策下，羽翼丰满起来的野心家、大军阀安禄山终于发动了一场分裂战争。这一场历时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成了唐朝中期一个突出的政治事件。“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澌洞昏王室”（9），杜甫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矛盾重重，动乱不已的时代。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上层统治集团同中小地主阶级之间、地方分裂割据势力同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这一时代的基本内容。儒法斗争的焦点，是分裂与反分裂、兼并与反兼并、侵扰与反侵扰、倒退与反倒退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杜甫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民族和睦，反对民族压迫；主张均亩，反对兼并；主张进步，反对倒退。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杜甫的作品也不可能离开这一条普遍的规律，他的作品精华部分在客观上是反映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为法家政治路线服务的。

第一、杜甫反对分裂，反对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杜甫早在“安史之乱”前就尖锐地看出朝廷对藩镇割据势力的宠信和放纵，必然会招致恶果。他指出：“坡陀全虾蟆（指安禄山），出见盖有由。至尊（指玄宗）顾之笑，王母（指杨贵妃）不肯收。岁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10）当安禄山横行幽燕一带，剑拔弩张之时，杜甫在《后出塞》中向朝廷发出警告：“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遥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并同时揭露这帮匪徒进行战争准备的阴谋活动：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他热切呼吁要有武备，痛斥那些粉饰太平的御用儒生，号召“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11）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把自已的命运同平叛战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当官军作战失利时，他长歌当哭，“四方义军同日死”（12）；听到胜利的消息，他手舞足蹈，“漫卷诗书喜欲狂”（13）。长安城破之日，王维等人作了俘虏，并受了伪职。杜甫却“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14），没有向分裂势力低头。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仍然念念不忘拯救困难。王安石曾赞誉他说：“瘦妻媪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15）。他离开当时的战场，流亡到大后方四川，仍然没有忘记统一和分裂这个重要的政治斗争，一看到剑门的峥嵘险峻，立即触景生情地写出了“吞并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的《剑门》诗，表示了突破天险，消除分裂的强烈愿望。由于当时的统治者采取了放虎归山、姑息养奸的错误政策，安史之乱形式上是“平定”了，但北方地区仍然是一个“幽蓟余蛇豕，乾坤尚虎狼”（16）的四分五裂局面，而且安史之乱没有波及的蜀川，也出现了“争权将帅诛”（17）的军阀混战，“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18），简直成了他们为所欲为、毫无法纪的野蛮世界。杜甫主张彻底消灭这些分裂势力，发出了“欲倾东海洗乾坤”（19）的感慨。他在《青丝》、《草堂》、《三绝句》等大量诗篇中，对这些分裂势力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杜甫不仅是一般地痛心疾首谴责分裂，而且进一步提出了消除分裂、维护统一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悍将握兵，是分裂的祸根。他指出“韩彭不易呼”（20），提醒统治者警惕韩信、彭越之流借尸还魂。后来著名的法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唐代藩镇之祸“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这一点，杜甫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杜甫还主张汲取西汉著名法家贾谊采用“强干弱枝”的作法，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他提醒统治者说：“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21），力主加强中央集权。他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在《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这篇重要的著作中提出了“将相之任，内外交迁”的主张，这是一个具有卓越政治远见的主张。实行这样的主张，有可能防止地方政权势力畸形发展，防止军事将领利用时机长期在一个地方营造独立王国。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使国家“根固流长”，获得“万代之利”的重大措施。

杜甫反对分裂，坚持统一，是有明确的政治路线的。“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22），他不止一次热情地歌咏太宗、武后盛世。他主张的统一，是法家路线下的统一。大历四年，杜甫针对商州、幽州、广州、桂州等地发生军阀叛乱的事实，在流落潭州时，很有感慨地写出了《蚕谷行》一诗，指出：“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对军阀割据予以严厉谴责，并期望迅速解除这种分裂状态，恢复安定的生活。“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幻想出现一个“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的世界。这就是他所梦想的“贞观盛世”，以及仿佛“贞观”的“开元全盛日”。斯大林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杜甫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那个“桃花源”式的理想国却永远只能是一个幻想。

第二、杜甫反对朝廷任用亲信，反对宦官外戚擅权，主张唯才是举，广开言路。

杜甫象中唐时期主张革新的进步政治家一样，对于宦官外戚擅权持否定态度。他用辛辣的笔调描绘这伙衣冠禽兽的儒家之徒的丑态，怒斥他们是来自腐草的虫豸：“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23）。他告诉皇帝：“君侧有谗人”（24）。他借题发挥，怒骂这批人“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儿媚至尊。”（25）认为他们是破坏太宗、武后制定的法纪，破坏“贞观”、“开元”以来国家的正常秩序，酿成祸患，造成战争失利的祸根。他说：“邠城反复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26）七六三年（即广德元年）吐蕃贵族军事政权入侵，由于宦官程元振对朝廷封锁消息，四十天内无人奉召御敌，“行在诸军阙，来朝大将稀。”（27）杜甫十分愤怒，发出了“闻道嬖孽能全身”（28）的质问，并责代宗：“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29）对于宦官操纵“神策军”趁战乱到处掳掠的罪行，他无情地予以声讨，指出“殿前兵马虽骁勇，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30）他在《诸将五首》、《萤火》等诗中尽情地揭露宦官贵族势力造成的民族危机。他恨不得让严寒来把这些害虫除掉，指着他们问道：“十月清霜至，飘零何处归？”（31）；他恨不得把他们一扫而光，“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32）

他一方面坚决地反对玄、肃、代皇帝的那一套用人路线，另一方面又热情歌颂太宗、武后用人得法。他认为当皇帝要“继体如太宗，端拱纳谏诤”（33），并且引用“否臧太常议，

面折二张势”⁽³⁴⁾的事例，赞扬武则天敢于纳谏的作风，提倡一种“直词宁戮辱，言路不崎岖”⁽³⁵⁾的风气。他热情歌颂秦汉以降的执行法家路线的名臣，把这些名臣作为自己的楷模，并且在《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具体指出用人必须是“智略经久，举事允惬，不陨获于苍黄之际，（有）临危（以）制变之明”的干练之士。他在《述古三首》、《入衡州》、《诸葛亮庙》、《折槛行》、《赠蜀僧间丘师兄》等大量诗篇中引古鉴今地提出要有象刘邦、曹操、李世民、武则天这样的皇帝，要选用象张良、曹参、肖何、贾谊、诸葛亮以及“磊落贞观事，致君朴直词”⁽³⁶⁾的贤相魏征这样一些法家人物，希望“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³⁷⁾。

杜甫在他任左拾遗前后，朝廷内的党派斗争是十分剧烈的。作为宦官政治的反对派房琯、严武、张镐等形成一个政治集团，杜甫无疑是置身于这一集团的。这一集团的代表人物房琯，是永贞革新的法家战士刘禹锡、柳宗元所尊仰的政治家（刘有《和西川李尚书汉州微月游房太尉西湖》诗两首及《和游房公旧竹亭闻琴绝句》，柳有《相国房公德铭之阴》）。他们在当时与宦官的斗争中都不见容于统治者，先后被宦官头子李辅国以及程元振、贺兰进明等人所排斥。先是房琯遭贬，接着严武、张镐、杜甫等都接踵而去。他们遭受排斥的原因，当时贬退房琯的诏书上说是“崇党近名”，“怙气恃权”，“虚浮简傲者进为同人，温让谨令者捐于异路”，“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³⁸⁾。说穿了，就是同那些趋炎附势、温让谨令的宦官李辅国一伙“异路”。杜甫身为八品的拾遗小官，竟以直言疏救宰相房琯而蒙罪，既说明当时以党争为形式的路线斗争形势的险峻，也说明杜甫恶丑好直的强烈爱憎。面对房琯罢相，张镐离朝，严武、贾至被贬而自己人微言轻，势孤力弱的景况，杜甫曾以“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更愁人”⁽³⁹⁾的诗句来抒写自己的苦恼心情。在秦州《寄贾司马严使君五十韵》中，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故人俱不利，谪官两悠然。开辟乾坤正，荣枯雨露偏……亲故行稀少，兵戈动接联。他乡晓梦寐，失侣自速遄。”杜甫是以舍功名来保卫他的政治信仰的。

第三、杜甫反对非正义战争，支持正义战争，主张足食足兵和耕战政策。

唐中期的统治者们都是在和平居民面前的黩武主义者、在强敌面前的逃跑主义者或投降主义者。杜甫在战争问题上同这伙儒家之徒的观点是完全两样的。杜甫热情支持平叛和抗御侵扰的正义战争，指出对叛乱分子的镇压和抗御侵扰是“恭行天罚”⁽⁴⁰⁾。在安史之乱中，他召唤武者挥戈，“猛将宜宣胆，龙泉必在腰”⁽⁴¹⁾；文者从戎，“垂泪方投笔，伤时即据鞍。”⁽⁴²⁾他借一个新婚女子的口，号召群众起来战斗：“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⁴³⁾。他关心战局，常常分析敌我形势，积极为唐军谋划。当叛军进逼潼关时，他指出潼关地势险峻，宜守不宜攻，守军“铁马云雾积”⁽⁴⁴⁾，足以拒敌关外。但守军在统治者儒家路线指挥下，仓卒出关应战，结果三日之内，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对这一惨痛教训，杜甫在《潼关吏》等诗中曾多次提到。他说：“胡来自自守，岂复忧西都”，“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长安沦陷时，他还在《塞芦子》中为唐军在芦子关的疏于防守深感焦虑，指出它在军事上的利害得失：“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在《悲青坂》中，他希望唐军不要仓卒出战，要等

待时机举行反攻，“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杜甫对于彻底平叛抱有坚定的决心，坚决反对朝廷在平叛问题上的苟安政策。他主张“国须行战伐”（45），用武力彻底平叛；“伐叛必全惩”（46），对叛将毫不留情。当唐军节节胜利进逼长安时，他要求从全局着想，分兵直捣叛贼老巢，“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47）不要把眼光放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七五八年，九节度使围攻邺城，昏庸的肃宗派宦官鱼朝恩任“观军容使”，在“王师有征无战”的儒家腐朽教义指导下，“大军云合”却“蔚然未进”。杜甫看到了错误的战略战术导致战局恶化的危险性，在《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一文中，对这种蠢猪式的战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大军不进的原因是“陛下犹覬其匍匐相率，降款尽至，广务宽大之本，用明恶杀之德”。他揭穿了叛军“降表继至”的诈降阴谋，一是想拖延时间，“望秋高马肥之便，蓄突围拒撤之谋”；二是“平庐兵马在贼左胁，贼动静乏利，制不由己”。接着提出了“穷掎角之进”，“避实击虚”，“逐便扑灭”残寇的战略战术；严肃地批判了“王师有征无战”的儒家教义，指出“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诸市朝，大者陈诸原野”，使用武力是完全必要的。与此同时，杜甫还在《观兵》等诗中进一步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作战意见：“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既用一部分兵力围攻邺城，同时又派精兵迂回直捣叛军后方范阳，形成四面交攻“相与出入掎角”，使敌成瓮中之鳖，不但邺城可拔，叛军也可能被全歼。但是“疲茶苟怀策，栖屑无所施。”（48）杜甫这些很有见识的战略和策略，都被统治者们置若罔闻了。

杜甫为了实现“以战去战”平定叛乱，实现统一的主张，在一些论文中还鲜明地提出“足食足兵”和兵农合一的耕战思想，反对“去兵去食”的儒家教义。他在《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中说：“盖有兵无食，是谓弃之”，“况寇犹作梗，兵不可去。”由于儒家路线的破坏，当时“有兵无食”的情况十分严重，曾导致多次战斗失利。他在《西山三首》中就谈到唐军久战不胜的状况：“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他在《东西两川说》中总结松、维、保三州尽管有“惯于战守”的“山东劲卒”的防守，最后却陷于吐番的原因时说：“顷三城失守，罪在职司，非兵之过也，粮不足故也”。杜甫认为要改变“粮不足”的情况，“使军旅足食”，一方面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还要“复屯营之制”，搞兵农合一，战时打仗，平时耕田。他在《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中提出：“近者郑南训练，城下屯集……明发教以战斗，停午放其庸保，课乃菽麦，以为寻常。”正如后来他在《谒先主庙》一诗中所说的，诸葛亮“复汉”留下了“杂耕”亦即屯垦这样一个“长策”；这“长策”显然为杜甫所确认和接受了。

杜甫是正义战争的积极支持者，同时又是非正义战争的坚决反对者。开元中由于在唐玄宗黷武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宦官杨思勖领兵对交趾发起了侵略战争，残酷地镇压和杀戮交趾人民。代宗初期宦官吕太一收珠广南，阻兵作乱，战火祸及交趾。这两次损害交趾人民利益的不义战争，杜甫都坚决反对。他在《诸将五首》中说：“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指出唐帝国与交趾是有明确的边界的。由于唐朝对交趾的侵略战争，破坏了两国间的睦邻关系，使正常的经济和技术交流中断，杜甫表示十分惋

惜。

杜甫在《前出塞》中写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在制侵凌，岂在多杀伤。”明确地指出战争的目的在于“制侵凌”，不在于“多杀伤”，更不能以战争去侵略别人，“立国自有疆”。杜甫的这种反侵略反黩武主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应当加以肯定的。然而，苏修叛徒集团却借此大肆发挥，给杜甫戴上一顶什么“和平诗人”的帽子，似乎杜甫在那里不分正义和非正义而一概地反对战争，这完全是一种不顾事实的无耻捏造，其罪恶用心就是妄图利用杜甫来散布和平麻痹思想，松懈革命人民的斗志，任凭他们这些超级大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对苏修散布的这种谬论，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第四、杜甫反对豪强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主张均亩薄敛，发展农业生产。

安史之乱以后，地方藩镇势力连年混战。他们同豪强大地主相互勾结，更加猖狂地兼并土地，使大批失地农民流离失所，就是一些中小地主也纷纷破产，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杜甫在《东西两川说》中指出“豪族兼有其地而转富”，丧失土地的农民“近者交互其乡村”，“远者漂寓诸州县”，“大抵只与兼并豪家力田”。由土地兼并而造成的“均田制”的破坏，导致了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租庸调”法的破坏。霸占大量田地比豪家不纳租税，不服徭役，而“无耕之地”的农民却担负着繁重的赋税徭役。“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49），贫富悬殊加剧，劳动人民苦难重重，“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50）。国家收入锐减，国库空虚，“偏裨限酒肉，卒伍单衣裳”（51），军队缺少衣食，影响了平叛和抗御侵扰的战争。针对这种情况，杜甫坚决主张禁止豪强地主掠夺和买进农民的口分田，在《东西两川说》中指出，必须实行“诸田（指口分田）不得贴赁”的唐旧例，必须“仍禁豪族受赁罢人田”。同时要求严厉打击那些利用政治特权进行兼并和纵容兼并的“黠吏”、“豪吏”。他说：“两川县令刺史有权摄者须尽罢免。”他在许多诗中还揭露了豪强、官吏结为一体的巧取豪夺，大搞兼并的罪恶行径：“奈何黠吏徒，鱼夺成遁逃。”斥责他们“索钱多门户”，“刻薄及锥刀”（52）。杜甫幻想统治者复行太宗时的“均田”制和减轻赋税徭役。他在《东西两川说》中说：“但均亩薄敛，则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他要求给农民的负担要合理和“均”，“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53），甚至发出了“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54）的呼声。他认为，为了实行“均亩薄敛”，“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55），就是要使“蝼蚁”们高兴而“鸱枭”们倒楣。

杜甫这些抑制兼并，均亩薄敛的思想，都体现了他关于发展封建经济的根本观点：“谷者百姓之本”（56）。在封建社会里，务农是富国强兵的根本途径。法家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农耕。武则天曾说：“建国之本，必在于农”（57）。杜甫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他在《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一文中明确指出：“谷者所以阜俗匡时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这同先秦法家管仲“使千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58）的主张一脉相承，而同当时的唐统治者和儒家之徒“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59），根本不重视农业生产，只知“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60）的奢侈浪费尖锐对立。由于杜甫重视农耕的主张同迅速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愿望相联系，因

此，即使在动乱的岁月里，他也忧心忡忡地关注着“黍地无人耕”⁽⁶¹⁾的情况。在战争紧张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耕”⁽⁶²⁾。他看到下雨有利于农耕就高兴，“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⁶³⁾；当下雨不利于农耕时，又“吁嗟乎苍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⁶⁴⁾。由于平叛和抗御侵扰的战争需要大量兵力，他在给严武当幕僚时，就积极建议从监狱里放出交不起租赋的农民，以解决农村劳力不足的问题。杜甫的这些主张，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农业的发展的。

杜甫重视农耕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关心水利、商业、盐铁官营等方面。在水利问题上，杜甫十分赞赏唐太宗的功绩：“控引淮海，漕通泾渭，因舟楫之利，达仓庾之储，又赖此而殷”⁽⁶⁵⁾。指出水利搞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农业的收成，交通的发达，国家的殷富。他在《石犀行》一诗中曾热情歌颂秦时李冰主持修筑都江堰的功绩。在盐铁问题上，他积极支持官营。当时官盐的收入，是唐政府平叛战争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杜甫在《盐井》、《入奉行赠窦侍御》等诗中，赞扬官家用火井煮盐的先进方法：“官作既有程”；描绘了生产的繁荣：“煮井为盐速”，“出车日连连”。在商业问题上，他赞颂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工商业，“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⁶⁶⁾，“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⁶⁷⁾，等等。他对于盘剥人民，牟取暴利，破坏盐铁官营，私铸假钱的奸商，却给予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

第五、杜甫反对民族压迫，提倡民族之间和睦相处。

唐玄宗即位之后，凭借唐兴百余年来积蓄的物力财力，对吐蕃、奚、契丹、南诏等少数民族大肆征伐，频频发动战争，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杜甫对这种穷兵黩武，欺凌少数民族的行为深为不满。他嘲讽地说：“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并以“百万攻一城”，“尺土负百夫”⁽⁶⁸⁾的诗句反映当时的战争中，因攻占一城一地而不惜动用大军，因遭受被欺凌者的抵抗而付出惨重代价。天宝十年，鲜于仲通出兵南诏失败，“士卒死者数万人”，身为当朝重臣的杨国忠不但“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而且进一步“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⁶⁹⁾，妄图挽回败局。杜甫针对此事写了《兵车行》一诗进行控诉，并且指出这种不义战争的恶果严重。他责问说：“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战争是造成经济凋敝的重要原因。他在《又上后园山脚》一诗中分析“平原独憔悴，农力变耕桑”的原因“非关风露凋，曾是成役伤”，是比较中肯的。不仅如此，他还在《后出塞》中深刻地揭露了在“两蕃静无虞”的情况下，“献捷日继踵”的阴谋，指出正是黩武政策导致了分裂势力的抬头。

唐玄宗对少数民族黩武不戢，宠信边将，酿成安史之乱，致使唐帝国急剧衰落，一蹶不振。这时吐蕃等军事贵族集团乘机侵扰、抢掠人畜、占领土地，甚至一度攻陷都城长安。一味欺凌少数民族的唐统治者，往日威风，扫地以尽。他们在军事贵族的侵扰面前软弱无能，不是“令僧讲诵《仁王经》以退之”，就是弃城逃窜或妥协投降，儒家之徒的丑恶嘴脸和腐朽本质真是暴露无遗。杜甫既反对唐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欺凌和掠夺，同时也反对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的侵扰和破坏，而且主张坚决加以抵抗。七五七年以后，腐败的唐王室一味依赖回纥军事贵族集团的兵力来平定内乱，甚至不惜订立“克城

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女子皆归回纥”的丧权殃民的条约，放纵回纥军队长期留驻，为非作歹。杜甫预感到借兵回纥将会造成无穷后患。他写道：“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反对把平定叛乱的希望寄托在外援上。七六二年，唐又派李适（即后来的德宗）向回纥借兵，受尽凌辱。杜甫悲愤地写道：“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又一次向朝廷提出警告。杜甫反对少数民族的侵扰，主张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他以“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的诗句，歌颂基于平等原则的和亲政策；但是，他却反对屈辱性的和亲。他在《留花门》、《警急》、《即事》等诗中对肃宗的屈辱性和亲于回纥贵族表示非议，认为这样的和亲无济于事。他在《警急》诗中说：“才名旧楚将，妙略拥兵机。玉垒虽传檄，松州会解围。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认为只有兵机妙略才是御侮的正道。后来宁国公主劈面放归，杜甫闻讯又愤又忧，再次谴责了屈辱和亲：“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70）

唐统治者大搞妥协投降的勾当，使得回纥、吐蕃等贵族军事集团更加得陇望蜀，强悍骄横，侵扰连年不断，其规模也越来越大，给劳动人民带来极大灾难。杜甫在《征夫》一诗中反映：“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七六三年，吐蕃军事贵族集团侵扰，代宗出奔陕州。杜甫面对战乱，愤慨万端地写了《释闷》、《巴山》、《早花》、《天边行》、《伤春五首》等诗，嘲讽统治者的孱弱无能：“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71）；严厉斥责身据文武要职的儒家信徒的仓惶逃命：“狼狽风尘里，群臣安在哉？”（72）面对这伙不是忙于奔逃，就是忙于念经的儒家之徒，杜甫厉声责问：“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纆？”（73）他主张坚决而有效的抵抗：“时危当雪耻，计大岂轻论。”（74）他盼望良将精兵赶快投入战斗：“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轸擒西戎。”（75）他支持和鼓励严武出师收复失地：“公来练猛士，欲夺天边城。”（76）他要求朝廷任用象汉时的霍去病那样的大将去制敌取胜：“汉朝频选将，应拜霍嫫姚。”（77）他大声疾呼：“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78）希望当朝皇帝能象汉高祖一样，指挥猛士雄镇四方，平定少数民族军事贵族的侵扰，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七六四年春，杜甫在成都写的《登楼》一诗中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杜甫面对“万方多难”的现实，抒发自己忧国的情怀。一方面，他一再把抵御吐蕃入寇，维护统一，中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李氏朝廷身上，正告吐蕃等少数民族军事贵族不得猖獗侵扰；另一方面，他又借蜀后主讽谕代宗的无能，思慕当今朝廷能有一个七擒孟获的诸葛亮，施展文治武略，靖定侵扰，搞好民族关系，表达了杜甫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主张。

列宁指出：“政策是同一定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杜甫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民族等问题上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唐王朝的封建统治，而同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相联系。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具有一定的尊法倾向，基本上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要求。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执行儒家路线的唐中期封建统治者当然不会采纳杜甫的正确主张。宋朝爱国诗人陆游在《读杜诗》中很有感慨地提到：“看渠胸次隘宇宙，借哉千万不一施。”杜甫自己也说：“文

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79)杜甫正确的政治主张没有为他同时代的统治者所采纳，但作为一笔文化遗产却为今天新中国的人民所重视。杜甫作品的得失，即其作品中的精华和糟粕固然是杜甫自己所不能真正认识的，但却可以由今天的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之下作出正确的判断。

(二)

杜甫尊法倾向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儒法两条路线的矛盾，制约和决定着杜甫思想的演变和转化。

杜甫是戴着儒冠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出生于一个“儒门旧史长”(80)的官僚家庭，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与熏陶，“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81)。他七岁咏诗，九岁学书，一切都以儒家典籍为准。他念念不忘“奉儒守官”(82)的身世，“不敢忘本，不敢违仁”(83)。他以儒学为“素业”，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84)为自己唯一的政治抱负。但是杜甫青年时期又生活于所谓的“开元盛世”，那时太宗武后的一些进步政治措施还在发生影响，政治界和思想文化界还比较活跃。杜甫广泛涉猎诸子百家之说，广泛地接触像李白那样非尧舜、笑孔丘的具有法家政治色彩的人物。杰出的法家诗人李白对杜甫不会没有影响。在杜甫身上，除了有“学诗犹孺子，乡赋忝嘉宾”(85)的一面，还有“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86)的另一面。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不是一个纯儒。他在青年时曾经“裘马颇轻狂”地过了“快意八九年”(87)的浪游生活，时而临钱塘江而怀想秦皇，时而叩碣石以凭弔魏武，在吴越齐赵之间留下游踪，领受所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88)的“开元盛世”的风光。

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于七四六年(天宝五年)到了长安，企望能够获得功名，参与政事。但那时唐王朝的政治已经日趋腐败，儒家路线更加得势，豪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李林甫之流把持朝政，对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政治活动横加排斥。据元结《谕友》说：“丁亥中，诏天下有一艺者皆诣京师就选。林甫奏待制者悉令尚书考试，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野无遗贤。”杜甫是这一场大骗局的一个受害者。这一事件给杜甫留下了创伤，他在七五一年回忆此事时说：“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霫忌刻，万事益酸辛”(89)，朦胧地感受到“儒术诚难起”(90)的悲哀。杜甫怀才不遇，四处碰壁，“卖药都市，寄食朋友”(91)，“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92)，一天天地认识到“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93)。七四八年，他三十七岁，在求左丞韦济汲引的赠诗中，他进一步抒写了自己的悲凉心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94)。严酷的现实告诉他，“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95)他在穷愁潦倒之中以饮酒赋诗来缓解充满矛盾的痛苦心情：“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96)，流露出无限的怅惘，是他徘徊歧路、上下求索的真实写照。当时，唐王朝的政治已经腐败到了极点，玄宗骄奢淫佚，穷兵黩武，横征暴敛，

造成了民生凋敝，生产衰落。杜甫面对这种大厦将倾的危险而忧心如焚。七五二年，在长安登慈恩寺塔时，他是“登慈翻百忧”，心潮起伏不已。“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97），他已预感到潜伏着的一场危机将一触即发。面对山河即将破碎的现实，他仿照屈原以借喻的手法在诗中写道：“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崑崙丘”（98）。这是他第一次对准玄宗，把理想中的法家路线与眼前执行儒家路线所造成的腐败政治作了对比，这是他要求改革政治，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法家色彩的初次表露。他以“不得同冕错，吁嗟后郗诜”（99），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挽救国家的危难，而悲痛万分。在“有儒愁饿死”（100）的境况中，在《醉歌行》这首诗里，他终于迸发出血泪的呼声：“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是他决心与腐儒式的故我分手的一个转折。他直呼当时被玄宗封为“文宣王”的孔丘其名，这无异是对儒学的一次挑战。他在这首诗中曾经写出产生这种思想的具体环境：“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簷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他向儒学挑战的力量，是来自饥饿的人民群众。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而引起的“安史之乱”，造成了兵连祸接、战乱不息的动荡局势。这时狂飙匝地而起，偌大的唐帝国表面繁荣的经济基础顷刻瓦解，杜甫也被这一场风暴刮到了社会的下层，使得他能与难民为伍，颠沛流离，亲身领受“牵身筋骨劳”（101）、“世梗悲路涩”（102）的酸辛，耳闻目睹广大农民在兵役、赋税的压榨下的惨痛遭遇。安史之乱前后的生活实践，使他写出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103）这样一些反映社会阶级矛盾的杰出诗篇。这些诗就其客观意义来说，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文人作品中的里程碑。他面对由战祸造成的“园庐但蒿莱”（104）的萧条景象和“青山犹哭声”（105）的民间疾苦，对儒家那一套虚伪的说教感到失望。他感慨系之地说：“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生？”（106）安史之乱不仅是时代的转折点，也是杜甫思想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杜甫的尊法倾向日趋明朗。

杜甫的思想转变，主要是由于投身社会生活，比较接近人民。但他的学习环境和交际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开元间唐室仍因袭太宗、武后时采用的科举取士制度，当时除“明经科”外，其他“进士科”、“道科”、“直言敢谏科”、“超群拔类科”等均不专以儒经取士。七一五年（开元三年），朝廷“招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术数之士，皆处之于翰林院”。七一七年（开元五年），还下令访求民间逸书编成群书四万八千卷（107）。这样一些措施，使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得以遍览百家之说。杜甫是主张“读书破万卷”（108）的。他生当所谓的“开元全盛日”，不仅饱读儒家典籍，而且也读兵书及诸子之书。他在《进鹏赋表》中说过：“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这里的“数子”就是指的先秦诸子。他曾经耻笑过别人是“小儿学问止《论语》”（109），是不以仅读一点儒家之书为满足的。他常以“暗诵”“群书万卷”（110）、阅“百氏之书”（111）等语句称美别人。七五七年夏，他在送族弟杜亚赴任河西判官所写的赠诗中，曾竭力称赞杜亚“兵法五十家，尔腹为篋笥”，而且“应对如转丸”，可见他们是经常在一起细论兵法的。他和《天宝军防录》的著者郑虔过从甚密，交往很深，曾写诗赞郑“兵流指诸掌”，（112）从这些书籍和社会交往中，杜甫除接受儒家思想外，也会吸取若干法家的进步思

想。在《夏夜叹》中，他提出了“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这样一个富有唯物意味的观点。基于这种观点，他能够比较正确地解释自然现象，认为气候的阴阳寒暑是由于时序轮转而发生的规律性变化，不相信搞什么“焚巫”。他反对铺张浪费的祭祀，主张薄葬，讽刺那些搞“丹砂”、“翠羽”和访道求仙的迷信活动。特别可贵的是，他在《石犀行》、《石笋行》中极力破除迷信，突出宣传“人定胜天”的思想：“修筑堤防出众力”，“诡怪何得参人谋”。他用进步的观点分析历史，得出了“英雄割据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113）的正确结论。正由于他具备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才能够正视现实，不回避矛盾，能够“自断此生休问天”（114），不断在社会实践中探索前进，逐步突破儒家思想的桎梏，接受法家思想的影响。由于他面对现实，体察社会下层的生活，洞观社会的深重灾难，因此，他能够提出“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115）的改革政治的正确观点。他仔细地研究了唐开国以来历代编年大事记的《实录》（“尝读唐实录”（116）），经常和别人详尽地讨论贞观的体制（“密论贞观体”（117）），明确地认识到唐初以来“百余年间未灾变”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有“叔孙礼乐肖何律”（118），是汉承秦制，唐承汉制，实行法家路线的结果。他盛赞“贞观之治”和武后的政绩，分别以“一剑总兵符”（119）和“临轩御乾坤”（120）的诗句来赞扬太宗和武后，并且以“贞观之治”为标本来鉴别、评论当代的政事（“贞观是元龟”（121））。针对时弊，他提出改革主张，希望当时的朝廷能“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122）。他早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在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实践中已得到修正，其内在的实际政治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尧舜已经是“太宗”、“武后”的代称了。他在《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中说得很明白：“兹事（指‘古先圣哲’之事）玄远，非愚臣所测。臣闻易载随时，不俟终日”，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法家韩非“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123）思想的脉络。实际上他追求的已不是遥远的虞舜之治，而是有具体内容的“贞观之治”了。

杜甫死于漂泊流离的生活之中，“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124），他“致君尧舜”实现“贞观之治”的志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衰减。他说：“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125）七六九年，是他临终的前一年，他结识了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苏涣，引为莫逆之交。他把“致君”的希望托付给苏涣：“致君尧舜付公等，早登要路思捐躯”。（126）当然，苏涣后来为造反而捐躯，这是杜甫所始料不及的。苏涣走的是一条由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向起义人民靠拢的路线，而杜甫则是走的一条由儒家信徒向法家营垒靠拢的路线。

（三）

杜甫的作品，卷帙浩繁，容量丰富，叙事抒情，议政议军，涉及的社会内容非常广阔，其间存在着一些彼此矛盾的现象。最突出的是他在政治上既表现尊法的进步倾向，又不时流露出某些儒家的观点，使用着许多儒家的语言。应当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

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是不难回答这个问题的。

自从董仲舒奏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便成了统治思想。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说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坚持进步路线的法家人物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的拖着儒的尾巴或表现某些“儒气”，这是不足为怪的。在一些法家著作中，有许多思想是用明确的“法家的”语言来表达的；但也有的是从儒家的语言中寻找外在的形式。对于后一种情况，只能“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对于诗人杜甫的研究，当然也应当着眼于内容，着眼于实质。必须把杜甫维护统一、重视耕战以及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主张民族和睦相处、反对民族压迫的政治主张，同儒家的所谓“忠君”、“民本”以及搞“仁政”、“德治”那一套东西加以区别。要把杜甫作品中为错误的形式所笼罩的民主性精华的东西同那些封建性的糟粕加以区别。要注意到杜甫以及杜甫作品的历史发展，注意到杜甫在使用某些概念时，在不同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赋予的不同的、特定的涵义。如杜甫在《有感五首》中曾提到“授钺亲贤往，卑官制诏遥。终依古封建，岂独听箫韶”，如果只从字面上看，杜甫要依“古封建”，岂不是要恢复“先王之治”，搞历史的大倒退吗？事实是怎样的呢？杜甫这诗写于七六三年（广德元年），当时唐代政治的焦点在平叛，而地方割据势力又一天天膨胀，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杜甫在这首诗和《秋日荆南抒怀三十韵》、《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就指出要“授钺亲贤往”，“必以亲王委之节钺”，配合宰相房琯向朝廷建议委任诸王为都统节度使。这种“古封建”的措施，实际上是巩固中央集权、平定安史之乱的一项紧急而又重要的措施。正如李贽引用司空图的话那样，“盖当危难之际，以亲王重藩，分布外镇，夹辅王室，统击人心，自是良策。”（127）原来所谓的“终依古封建”，无非是一种假托。

杜甫作品中有浓厚的忠于王权的思想。他醉心仕途，“窃比稷与契”（128）“立登要路津”（129），像“葵藿倾太阳”（130）那样表示对皇帝的忠诚，像“饥鹰待一呼”（131），那样表示对仕途的向往。为了求官，他“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132），“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133）。求官不成，甚至还装模作样地要“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清景”。（134）这些东西显然都是杜甫身上庸俗不堪的阶级印记，应当被今天的人们所唾弃、所嗤笑、所批判的。但是从安史之乱前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杜甫所衷心拥护、积极支持的王权，却应当在客观上予以肯定。因为在当时分裂的危险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杜甫拥护王权的思想即忠君思想无疑是同维护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分不开的，而他热心仕进以及在某些问题上比较重视利用人民力量，则是忠君思想的附属物。如果说杜甫一生追求的就是当大官、作大儒，那么在长安城破之日，就尽可以同王维等人一起从安禄山那里求得一官半职了。但他并没有这样，他最终还是“麻鞋见天子”（135），舍长安而就了凤翔。这说明杜甫不是为求官而求官，是为实现一定的政治抱负而求官

的。事实上当时不论儒家或是法家，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都不能不献身于统治阶级的政权机构，都不能不在不同程度上重视利用人民的力量。问题的关键显然并不在于应不应该如此，而是在于他怀抱着怎样的政治目的以及所要实现的是什么路线，而这一条路线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有的人认为杜甫要“致君尧舜上”，有浓厚的“忠君”、“民本”思想，因此把杜甫说成是“诗中孔子”，这种看法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

杜甫诗中有大量篇幅反映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反映广大人民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藩镇割据势力以及少数民族军事贵族集团的黠武势力之间的矛盾，其中有些篇章如《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咏怀》、《悲陈陶》、《悲青坂》、《北征》、《洗兵马》、《岁晏行》以及“三吏”、“三别”等，其反映的真实程度是异常深刻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千百年来，这样的诗句能够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不是没有道理的。读着这些诗篇和诗句，不能不令人对当时朝廷内外的反动势力投以深刻的憎恨，而对于劳动人民的命运寄予深切的关注。但是，杜甫对于人民的态度毕竟有着严峻的阶级界限，这个界限是他在当时条件下所不能、也不乐意突破的。他的同情，仅止于对那些能够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一生长咨嗟”（136）的良民和那些与他有共同遭遇的“弃掷徬天隅”（137）的中小地主，而对那些不堪剥削压迫、铤而走险的“暴民”，那些会从根本上威胁李唐王朝生存的起义农民，他却是要目为“盗贼”，要“鞭雷公”降“滂沱”来加以镇压的。杜甫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批判和谴责，也仅止于暴露其超经济剥削和非法的迫害；他的批判的锋芒不是为了动摇封建的反动政权，而是为了使这个政权得到巩固。这是一种不可克服的阶级偏见。过去有些人言过其实地称誉杜甫，把他抬上“人民诗人”的宝座。其实阶级的偏见根本不可能引导杜甫成为什么“人民诗人”。列宁指出，马克思使用人民一语时，是要“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份联为一体”。杜甫能够同当时的人民“联为一体”，“把革命进行到底”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杜甫的作品反映了鲜明的尊法倾向，但确也有不少儒家思想的糟粕。杜甫在其痛苦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地同儒家思想分了手，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毕竟没有同儒家思想决裂，他的尊法的倾向是不大自觉的。他不时表露对儒家那套“仁政”思想的留恋和对“法治”思想的非议。一方面说什么“吾闻聪明主，治国用轻刑”（138），“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139）；另一方面对儒家教义始终没有忘情，直到临死前还在引发“孔门未应弃”（140）的悲声。因此，尽管杜甫在社会阶级斗争的风雨中经受了一番冲刷，而他身上的儒气终究是没有洗干净的，这是杜甫的一出悲剧。

尽管如此，就杜甫作品的基本内容而论，就杜甫本人的基本实践而论，杜甫始终不失为一个具有一定尊法倾向的政治诗人。他对太宗到武后所执行的法家政治路线的歌颂，对当时宦官外戚和分裂势力以及封建统治者的不同程度的批判，对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比较深刻的揭露，是占着很大篇幅的。这些构成了他一部分主要作品的基调，这是主流和本质的方面，是应当从基本上给予历史的肯定的。

在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史的研究工作中，在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工作中，对于政治诗人杜甫的研究目前还正在开始。像杜甫这样的思想比较复杂的古典作家，正确地评价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评价他们留下的遗产，是一个新的课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批判继承遗产的工作是同评法批儒的工作紧密相连的。我们愿意同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一道，在这方面做更深入的工作，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中国文学史的阵地，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参加本文写作和讨论的有：成都无缝钢管厂、成都塑料薄膜厂和成都翻胎厂工人理论组，杜甫草堂文物保管处，以及四川师范学院的部分教师)

一九七五年二月

注：

- | | |
|--|------------------------|
| (1) 《旧唐书·王叔文传》、《宋史·宗泽传》 | (33) (122) 《往在》 |
| (2) 《云溪友议》卷中 | (34) 《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 |
| (3) (15) 《杜甫画像》 | (35) 《行次昭陵》 |
| (4) 刘允文：《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 | (36)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 |
| (5) 《丽人行》 | (37) (62) 《洗兵马》 |
| (6) 陆贽：《奏议》 | (38) 《旧唐书》《房琯传》 |
| (7) 《又呈吴郎》 | (39) 《曲江二首》 |
| (8) 《奉送王信州崑北归》 | (40) 《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 |
| (9)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 (41) 《寄董卿嘉荣十韵》 |
| (10) 《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 | (42) 《送杨六判官使西蕃》 |
| (11) 《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 | (43) 《新婚别》 |
| (12) 《悲陈陶》 | (44)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 |
| (1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 (45) 《秋日夔州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
| (14) 《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 | (46) 《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 |
| (16) (21) (115) 《有感五首》 | (48) 《咏怀二首》 |
| (17) (20) 《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 | (49) 《驱竖子摘苍耳》 |
| (18) 《三绝句之一》 | (50) 《白帝》 |
| (19) 《遣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 | (51) 《入衡州》 |
| (22) (47) 《北征》 | (52) 《遣遇》 |
| (23) (31) 《萤火》 | (53)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
| (24) 《百舌》 | (54) 《宿花石戍》 |
| (25) (32) 《石笋行》 | (55) 《朱凤行》 |
| (26) (88) (116) 《忆昔二首》 | (56) 《说旱》 |
| (27) (29) (78) 《伤春五首》 | (57) 武则天：《臣轨·利人章》 |
| (28) 《霁闷》 | (58) 《管子》 |
| (30) 《三绝句》 | (59) (121) 《夔州书怀四十韵》 |
| | (60) (88) (87) 《壮游》 |
| | (61) 《羌村三首》 |

- (63) 《大雨》
- (64) 《九日寄岑参》
- (65) 《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
- (66) (113) 《夔州十绝句》
- (67) 《柴门》
- (68) 《遣怀》
- (69) 司马光等: 《资治通鉴》
- (70) 《即事》
- (71) 《释闷》
- (72) 《巴山》
- (73) 《岁暮》
- (74) 《建都十二韵》
- (75) 《冬狩行》
- (76) 《扬旗》
- (77) 《陪杨中丞次将士二首》
- (79) (81) 《偶题》
- (80) 《呈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随雨未遂驰
贺奉寄此诗》
- (82) 《进雕赋表》
- (83) 《祭远祖当阳君文》
- (84) (92) (94) (95) (108) (129) (133) 《奉赠
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 (85) (89) (99) (100) 《奉赠鲜于兆京二十韵》
- (90) 《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
- (91) 《进三大礼赋表》
- (93) 《赠比部萧郎中十兄》
- (96) 《乐游园歌》
- (97) (98)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 (101) 《避地》
- (102) 《送率府程录事还乡》
- (103) (128) (130)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 (104) 《无家别》
- (105) 《新安吏》
- (106) 《独酌成诗》
- (107) 据《杜甫年谱》
- (108) 《最能行》
- (110) (125) 《可叹》
- (111) (117) 《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 (112) 《八哀诗》
- (114) 《曲江三章章五句》
- (116) (119) 《别张十三建封》
- (120) 《赠蜀僧间丘师兄》
- (123) 韩非: 《五蠹》
- (124) 《泊岳阳城下》
- (126) 《寄递近呈苏涣》
- (127) 李贽: 《藏书》
- (131) 《赠韦左丞丈济》
- (132)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
- (134) 《汉陂西南台》
- (135) 《述怀》
- (136) 《负薪行》
- (137) 《别苏徯》
- (139)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
- (139) 《述古三首》
- (140) 《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